



导 言

0.1 国际直接投资的产生与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的问世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18 世纪 60 年代，蒸汽机的轰鸣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迅速扩大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新需求，使原来在国内活动的企业把目标瞄准了世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①在这样的动因下，资产阶级开始了它以“直接投资”为形式的“落户”与“创业”，以此来实现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的历史使命。

据统计资料，到 1879 年，英国向世界各地的资本输出已达 14 亿英镑，英国成了“世界工厂”，其工业产值占据了当时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三分天下。这一时期，另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量资本输出的国家是法国。尽管它的借贷资本已远远超过了工业

^① 《共产党宣言》，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1 月版，第 254 页。

资本，但至 1896 年，法国的资本输出总额已达 100 亿法郎，仅次于英国而居世界第二位。美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晚了近 60 年，当英国资本输出的足迹已遍及全球的时候，美国基本上还是一个纯资本输入国：1890 年主要采取直接投资形式的外国资本输入达 30 亿美元。直到 19 世纪末美国才有极少量的资本输出。但就在那个世纪之交，早期制造业投资的主体出人意料地冠以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姓氏。至 1914 年，美国制造业海外子公司达 122 家，而英国只有 60 家。美国以其在当时还是一个主要接受外国投资的债务国的身份雄居世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首。这表明，尽管早期的资本输出是“资本过剩”的结果，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国际直接投资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创新能力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经济结构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正是英国和欧洲大陆对美国投资所形成的经济环境和美国本身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投资又使日本成了当今世界上美国最强有力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手。如今同样的过程又在新兴的工业国家中重演着。在美、日、英扶植下成长起来的韩国、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由其经济环境的改变导致了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等一系列变迁，目前这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已呈现出咄咄逼人之势。

历史勾勒出的这幅画卷在叙述着这样的事实，当资本输出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尽管它还不被认为是现代定义中的以跨国公司行为为研究内容的直接投资，但作为一种古老、朴素的存在形式，它已蕴涵了直接投资全部最原始、最基本的信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它的世界性扩张联系在一起，对外直接投资正是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本能赖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它是资产阶级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其在世界范围内争

夺市场的必然结果。它从产生那一天起，就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环境、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等宏观因素紧紧联系在一起。直接投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载体。无论投资者或投资的接受者是否认识到，也无论从主观上他们是否愿意，他们之间所传递的不仅仅是投资对象本身，不仅仅是通过资本流动而产生了一座工厂，一条铁路或者别的什么，它还包含了一种以同样的方式向外复制自身的能力，它将先进的生产手段以及相应的管理方式，以这种最直接的方式输入到了那些根本不存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民族中去。它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在 150 年前就精辟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1 月版，第 254～255 页。

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它既表现为资产阶级一步步战胜封建贵族的社会进程，同时又是现代工业文明战胜小生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现在看来，这个进程还在继续着。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也开始对外直接投资。据有关资料记载^①，截至 1996 年年底，中国政府共批准兴办海外企业 1985 个，对外投资总额达 45.18 亿美元，分布在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在国际直接投资的总量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还很低，其中中国所占的比重更是微乎其微，但它却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在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伟大历史进程。

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在生产方式的革命上，我们还要完成许多原来要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因此，无论是从完成资产阶级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出发，还是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出发，都必须重述这个由资本主义率先谈起的话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中，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在于尽快地跻身于国际生产体系。即便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民族工业采取了种种保护性措施，如果不能迅速将其与国际生产体系接轨，其最终结果仍会导致我们走向衰败乃至灭亡。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必将得到相应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很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

^① 外经贸部：《对外经济合作统计资料》。

0.2 本文的研究对象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正走着发达国家已走过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的昨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今天。但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当年相同发展水平时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外部市场，发展中国家还有可能原封不动地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吗？

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该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发展比经济的增长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的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产业结构以致于整个社会结构和体制等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经济的增长，只不过是这种变化或者变革的一种外在的反映。对外直接投资是这种变化的产物。早期有关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往往偏重于对产生直接投资的驱动机制以及企业条件的研究，如追求利润最大化，具有垄断优势等，很少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一个国家产生对外直接投资能力之间的联系。这并非是一种忽略。因为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是大型跨国公司的行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是孕育跨国公司的前提条件。而且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产生主要是企业利益抉择的结果，国家作为一个政体对它的影响微乎其微。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现并步入国际直接投资的行列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事，它带来了早期直接投资理论不可能涉及的许多新问题。当前的直接投资理论，尤其是邓宁的折衷理论，已经注意到这一新的现象，并为解释这一问题做出了努力。邓宁曾经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将

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起来考察。但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与经济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一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对外投资却并不多。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对外大量投资。因此，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是研究经济发展。具体说要研究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市场结构以及一系列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与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国际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作为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把其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以至于将其忽略，这从方法论上讲不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然而这些问题毕竟是每一个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对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尤显重要，于是这便成了本文试图涉及的领域。

研究经济发展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已经步入工业化发展过程的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

第一，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而要成为这样一个主体，要求企业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制度的更新。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工业化国家，企业制度的创新是关键。而企业制度的改革又是企业能否成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关键。中国的企业正处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之中，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企业都不同的是，在中国目前条件下，企业制度的更新更直接地表现为一种国家行为，而不是企业的自发行为。尤其是大量国有企业的改造，是靠国家政策的推动进行的。因此，要解释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就不能不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制度更新问题。

第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现代企业的培育和发展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对外直接投资能够获得的利益，却不能因此而放弃。比如，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国家稀缺资源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往往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多体现的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而不是企业自身发展的结果。

第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往往会导致一部分资本产生不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流动。国家在宏观上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是必要的。需要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直接投资的关系，来确定合理的政策。

第四，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形成与一个国家的市场发育是有密切关系的。经济的发展将表现为市场的成熟，它既包括国内市场也包括国际市场。市场不仅是贸易的结果，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越来越多表现为直接投资的结果。不能设想一个在国内市场上都无法立足的企业能够走向世界。所以一个国家的市场发育水平和这个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同这个国家的对外投资是有直接关系的。

之所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发展中国家本身也是一个大概念，同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处在相距甚远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很难找出所谓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律。实际上，联合国有关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多数统计数据，无论是直接投资流入还是直接投资的流出，最终还是出自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同时，发展本身也意味着不确定和变化。例如，当一个国家能够大

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它实际上已迈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决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任何将发展中国家现有企业的行为特点固定起来去研究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

经济发展中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动态过程，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并非是一种确定不变的模式。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①曾指出“发达经济增长模型中，令人最不满意的是投资理论。尽管对企业投资计划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周期性调查，但是投资决策仍然无法用其他可观察的经济变量，做出恰当的解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虽然远比一度所想像的更复杂，但投资与增加生产潜力的关系也决非一个技术性常数，不受价格、技术进步等有关要素影响。不管怎样，在影响经济增长过程的重要变量中，相对来说投资是最不稳定、最难以预料的。”^②我们所做的只是一项阶段性的工作，务求对经济发展中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有所裨益。根据本文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当然要对我国已经发生的直接投资做一些实证性研究，同时为借鉴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也要对它们的直接投资做一些实证性研究。但本文的目的在于为我国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提供一些依据，在必须做一些规范性研究的同时，会更多地偏重宏观研究而不是企业行为。当然要解释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就不能不研究我国企业的现状。以及这些企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表现。但在本文中，这种研究是服从于对国家行为的研

艾伯特·赫希曼，世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不平衡增长”理论的创立者。出生于德国，曾就读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1941年赴美国。1952年起，在哥伦比亚担任政府财政顾问及私人经济顾问。1956~1957年被聘为耶鲁大学欧文·费雪研究讲座教授，此间，写成并出版了《经济发展战略》一书。

^② 曹征海等译、[美]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8页。

究的。

综上所述，把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恰恰是我们今天的需要。新兴工业国家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新事物，新兴工业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对外直接投资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对于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资本短缺的国家来说，应该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还是限制它的发展？当今世界正朝着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在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中，国际直接投资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其中，国际直接投资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本文试图涉及的领域。

0.3 本文的结构

本文除导论外，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进过程。一般研究认为，以海默为划时代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是对传统理论的否定。但实际上，以往的理论是沿三个方向来进行的。一是从资本流动的角度来研究，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三是从企业行为的角度来研究。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这是由于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际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导致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这是三个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的研究，相互之间既不是否定关系，也不是取代关系，更无所谓谁高谁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一直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核心。传统资本流动理论从宏观角度研究资本在国家间流动的成因，而现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更多地从企业角度研究导

致资本国际流动的动因。然而当今的世界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新的阶段，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国际直接投资具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宏观经济色彩。原有的从微观角度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已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今国际直接投资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在这个螺旋式上升的更高阶段，如何从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研究，已成为理论界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实际上，对国际投资理论从宏观到微观，再到微观和宏观的结合，这个螺旋式上升的研究轨迹，恰恰与国际投资所走过的道路吻合。而本文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经济发展中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现象进行研究，这是一个与前人不同的研究角度。

第二章从发展经济学的原理出发，研究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资本形成的特点不尽相同，进而对国际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同。与西方国家当年工业化的路径不同，当发展中国家迈入工业化进程时，西方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过程。以今天的国际环境而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条件下实现本国的工业化。这个外部经济环境既给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带来了压力，也提供了机遇。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大量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的基礎上的。而一个国家对外引进外资的需求，本身已经包含了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需求。“引进外资”缩短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使它们跳跃了自身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由速成而带有许多经济早熟的特点，使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显示出超越一般规律以外的某些特征。而这些特征恰恰是我们在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对外直接投资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本章并不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只是尽可能对这些相对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来说是一种特殊性的普遍现象做出合理性的解释。

第三章从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角度，探讨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直接投资的格局及特点。国际直接投资是世界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而经济全球化亦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使它们不必重蹈发达国家当年的覆辙，在对国际经济的参与速度、参与程度、参与方式上，都有了更为快捷的路途可寻。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改变了国际直接投资本身的一些规律，如打破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序进规律，企业可以在产品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切入国际化的进程。

本章还讨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区别决不仅仅是一个地域范围问题，它分别源于微观和宏观两个不同的经济层次。经济全球化不是哪个国际组织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哪些国家领导人倡导的，它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带动的从下至上的一种微观经济行为。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一种国家行为，但它可以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并行不悖，甚至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

第四章研究经济发展与跨国企业的关系。跨国企业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当今世界经济生活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因素。如果把跨国公司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研究，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现象，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和世界市场发展的产物。

本章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考证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形成的特点，一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与当年西方跨国公司明显不同，其最大特征是，它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潮流中，作为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复制品”出现的，因而它与当年西方跨国公司走了一条不尽相同的发展途径，更多地体现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那些特征。但问题的另一个

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就在于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情况在不断变化，因而其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条件也在不断地变化。能够孕育跨国公司的那些国家尽管仍然被列为发展中国家，但它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决不低于一百年前最初出现跨国公司的那些国家。而那些工业化水平很低，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也没有出现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在发展中，各国的发展速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有的还在一种相当落后的状态中。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强大到足以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抗衡时，似乎表明这个国家正在脱离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过程中。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研究的实质是对经济发展与跨国公司关系的研究。

第五章讨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影响。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时，更多考虑的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一项对企业来说是有益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来说则可能是有害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体现的只能是国家的整体利益。显然，国家与这个国家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别源于两种不同的利益驱动机制。二者的利益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则不一致。这样我们就不仅要研究个别企业的动机，而且还要从整体上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母国的经济影响。

本章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母国国内就业、母国进出口以及对母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影响取决于母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制约因素。由于这些因素都在经济发展中变化，因此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影响也必然不同。而且母国的经济制度对国际直接投资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力，对外直接投

资在一种经济制度下产生的正效应，在另一种经济制度下也许会变为负效应。但从本质上看，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就是母国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总的来说对母国经济影响是积极的，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越成熟，这种积极影响就越发能显现出来。

第六章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原因及特点，揭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典型特征。证明只有经济增长带来了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一系列变化，形成经济发展之势时，对外直接投资才成为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还表明，与完全在自由经济市场导向下孕育而成的西方跨国公司不同，当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步入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时候，世界经济已经露出了全球化的端倪。这使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树立了明确的参与国际竞争的意识。为了国民经济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初期给予了积极的政府导向，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将对外直接投资列为一项重要国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早期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表现为国家意志所体现的企业行为。这说明，当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企业面临一个共同的外部环境时，企业可以在国家的支持下，逾越当年西方跨国公司漫长的孕育过程，以后发之优势更为快捷地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国家意志在对外投资中发挥直接作用，这恰恰是经济发展中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别于完全在市场主导下发展起来的西方跨国公司的特色所在。

第七章是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除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的那些特点以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投资主体不成熟，而投资主体的不成熟除了母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外，还有一个体制问题。中国现有的具有一定实力的

跨国公司不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身发育的结果，而是本国所有制的产物，直接脱胎于计划经济。它们身上带有较浓厚的国家垄断的色彩，直接受控于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其战略规划、目标、模式、资金的投向必须与国家经济计划的规定相适应，有时甚至是出于政治上和发达国家斗争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常常是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国外单个的跨国公司进行较量，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而且在资源型投资上的国家行为往往更为有利。但这种体制纳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首先与市场经济接轨难度较大，另外由产权不明确引起的非经济行为和动机也直接影响投资收益。因此，企业制度的创新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

第八章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及政策问题。本章的研究建立在对国情的再认识以及对我国在国际经济环境中地位的再确立的基础上。认为从国情看，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而且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我国也并不占据有利位置。但我们现在置身的是一个国际竞争的时代，从经济战略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对于我国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之所以说它是挑战，是因为它迫使我们对于那些在现有经济发展阶段还没有孕育成熟的问题必须做出反应；之所以说它是机遇，是因为它提供了让我们超越自身发展阶段的那些可能。我们并不主张把自己关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门外，关键是要制定一个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实际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积极去创造对外直接投资所需要的条件，努力去占据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有利位置。为此本文提出，应当利用引进的外资改造传统工业，在立足国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积极向国际市场渗透。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应该放在资源型和贸易型投资上。

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演进

是什么促使企业到国外去投资？就企业的最终目的而言，是为了更高的利润。但这并不等于说有了对利润的追求，就一定会产生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企业都要追求利润，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冲动。显然，对利润的追求需要通过一定的条件，才能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动因。也就是说，存在一种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利益驱动机制。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有关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是沿三个方向来进行的。一是从资本流动的角度来研究，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三是从企业行为的角度来研究。本文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这是一个与前人不同的研究角度，尽管如此，前人的研究仍然是本文研究的一个理论的基础。因此，本文的研究仍将从对直接投资理论的回顾与总结开始。

1.1 资本流动与对外直接投资

1.1.1 早期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并

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直接投资理论的产生也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到跨国公司理论的漫长的认识过程。最初，人们只是在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对它略有涉及，它至多被视为国际投资的一种形式。

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萌芽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文库中。19 世纪初，大卫·李嘉图（D. Ricardo）在分析当时国际贸易形态时提出了“现金移动理论”。他的基本论点是：如果货币的价值不随货币数量的增减而变动，则贵金属就不会在国际间移动，货币数量也不会得到自动调节。当出口商品的价值量不足以抵付进口商品的价值量时，就必须输出黄金。黄金是一般等价物，充当商品交易的媒介。在一般情况下，商品交易所需的贵金属以一定的比例，按各国的财富和商业的状态，也就是按各国所必须支付的数额和频率分配于各国。各国之间进出口商品的价值不同，必然引起现金在各国间的移动。现金在各国间的移动又必然会调节商品进出口。

李嘉图的现金移动理论阐明了国际间现金移动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解释了一国动用现金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调节国际收支状况的情形。显然，货币在这里仅仅是作为一种支付手段来理解的，如果非要称其为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最多也只不过是平衡国家间贸易差额的一种手段而已。在当时国际贸易还是世界各国实现经济联系的主要渠道，国际间的资本流动还很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他还不可能建立起资本流动的概念。因而如果把李嘉图的现金流动理论作为早期的资本流动理论，未免有些牵强。

除了李嘉图的现金移动理论外，还有一些从货币角度研究资本的国际间流动问题的理论，如由英国学者葛逊（G. J. Goshen）的国际借贷论和德国经济学家阿尔明·古托斯夫基提出的借贷互利论等，都是从货币借贷关系的角度研究资本的跨国运动的。

李嘉图出现金流动理论后的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有了长足发展，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的国际流动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0 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 Fisher）以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为理论基础，从分析商品经济入手，提出了费雪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费雪认为，一国的资本存量是既定的。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一国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资本，分别生产现时商品和未来商品，以满足当前消费需要和未来消费需要。由于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资本生产特点和社会消费嗜好等不同，在生产现时商品和未来商品上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因而存在着商品交换的内在动力。不同的商品生产，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投资与储蓄的结构，当一个国家的投资大于储蓄时，需要引进投资；投资小于储蓄，需要对外投资。以调解对不同商品生产的结构，从而发挥不同国家的优势，并通过交换使各自的社会财富总量得到增加。如果以当前货币与未来货币来代替当前商品与未来商品，将投资解释为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和金融资产的供给，将储蓄解释为对金融资产的需求和货币资本的供给。那么不同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率的差异，这种利率的差异必然要引起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又必然使利率趋向平均化。因此，利率的差异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动因。费雪理论深化了对资本国际流动的认识，对于分析早期国际资本运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费雪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费雪所指的国际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资本的流入国、流出国都是资本价格（即利率）的接受者，没有决定利率水平的能力。而实际上，在 20 世纪初，国际资本流动大都表现为资本主义宗主国的金融资本流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资本流入国与资本流出国之间由于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在国际资本运动过程中的地